

帝汶华人：塑造东帝汶过程中的峇峇、客家人与广府人*

——帝汶岛华侨华人的移民历史

[美国]道格拉斯·卡门，陈杰杨著，周珏译，马建福审校

摘要：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早期，来自中国福建、广东等地的闽南人、客家人、广府人等群体，出于贸易需求、殖民政策推动及清朝海禁等因素，陆续迁入帝汶岛。在葡萄牙殖民统治、荷兰殖民竞争、中国辛亥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印尼占领等重大历史事件影响下，这些来源多元的群体历经数百年融合，逐渐形成“东帝汶华人”的身份认同。文章还探讨了海外华人研究中存在的经济刻板印象、政治忠诚争议等悖论，分析了帝汶岛地理生态特征、葡萄牙帝国忽视、华人群体构成的特殊性对当地华人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揭示了华人在帝汶贸易拓展、咖啡产业兴起、殖民行政协助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打破“殖民经历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二元斗争”的传统认知，展现了华人作为“必不可少的局外人”在东帝汶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帝汶岛；华侨华人；移民历史；身份认同；殖民统治；海外华人研究

作者道格拉斯·卡门(Douglas Kammen)，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陈杰杨(Jonathan Chen)，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研究生。译者周珏，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性别文化研究；审校者马建福，北方民族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南亚国家研究、饮食人类学、人类学与世界民族研究。地址：香港，邮编999077。

2006年6月1日，梅州电视台的《梅州新闻》报道：30名海外华人访问中国广东省梅县松口镇，其中25人成功“寻根”，与亲属热泪团聚。这些人通过厚重的族谱核实祖先身份，随后与亲属取得联系。报道用生动的语言详细描述了团聚的场景：一位李姓海外华人在《李氏族谱》中发现祖父名字后泪流满面；另一位在《黎氏族谱》中找到自己名字时兴奋不已，自豪地告诉子女，松口镇蓬下村是他们的祖籍地；还有人在祖先祠堂的神龛前跪拜，失声痛哭。尽管报纸仅称这一群体为“侨胞”，但他们并非普通访客——他们来自东帝汶。这个2002年才宣布独立的年轻国家，在独立仅四年后，就因政治精英与安全部队的冲突陷入动荡，首都爆发暴力事件，超10万人流离失所^①。然而，在梅县，东帝汶的动荡无关紧要。对家族姓氏的核实印证了

*道格拉斯·卡门和陈杰杨合著《帝汶华人：塑造东帝汶过程中的峇峇、客家人与广府人》(Cina Timor: Baba, Hakka, and Cantonese in the Making of East Timor)时，曾到访帝汶岛客家华侨华人的祖籍地梅县，并在嘉应学院客家文化研究院查阅资料。本文节选自该书引言与第一章，感谢作者及耶鲁大学东南亚研究委员会(The Council on Southeast Asia Studies, Yale University)授权嘉应学院客家文化研究院周云水组织人员中译。

^①若要从历史视角研究2006年东帝汶危机，可参阅道格拉斯·卡门的《臣服东帝汶：中央权力与东帝汶族群认同的起源》(Subordinating Timor: Central Authority and the Origin of Communal Identities in East Timor)，该文刊载于荷兰皇家科学院《东南亚、非洲与美洲研究学报》2010年第166卷第2—3期；若需深入分析此次危机的核心参与方及事件发展脉络，可参阅国际危机组织发布的报告《化解东帝汶危机》(Resolving Timor-Leste's Crisis)，该报告收录于《亚洲报告》(雅加达/布鲁塞尔)第110号，2006年10月10日发布。

“华人身份”，这一群体被中国认定为海外华人离散群体(diaspora)的一部分。海外华人“寻根”或中国对其离散群体的身份界定并不罕见，但梅县的这场访问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切入点让我们思考：这些来自福建、广东两省，操闽南语、客家话、粤语的人，曾先后隶属于清朝、葡萄牙国王与苏哈托将军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最终如何成为“东帝汶华人”(Cina Timor)？

一、帝汶岛华侨华人的来源

在这场热泪盈眶的松口寻根之旅前的两个世纪，帝汶岛上的“华人”可能不足200人，其中在葡萄牙宣称拥有主权的东半部区域居住的不超过50人。19世纪初，这些人或许根本没有“中国人”的概念。他们只会认为自己来自A村或B县，属于C宗族；在帝汶岛上，他们要么生活在原住民首领K的领地，要么受殖民势力Y的统治，与Z镇的人有商业往来。事实上，在殖民者眼中被视为“华人”、最终自认为“东帝汶华人”的群体，身份极为多样，我们需要探讨他们源于中国本土语言群体、祖籍地和社会背景的多元身份。

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抵达帝汶岛的部分华人，可能自认为是满族统治下的清朝(1644—1911年)的臣民，或许会按照清朝的要求留辫子(这一规定几乎延续至王朝的末期)。但作为来自福建沿海的闽南人或广东东北部嘉应州的客家人，他们也可能怀有反满情绪，并对前明王朝(1368—1644年)怀有代代相传的模糊忠诚。在帝汶岛，这些早期侨民从事贸易、与原住民首领建立商业关系、与当地女性通婚。多数男性或许希望有朝一日能返回原籍地，与留守的家人团聚。他们的子女是跨种族婚姻的产物，在克里奥尔文化的环境中长大，后来被称为“峇峇”——这一术语最常与英国海峡殖民地相关，但在荷属东印度部分地区也有使用。而在古邦的荷兰殖民者和帝力的葡萄牙官员眼中，他们被不可避免地归为“华人”。

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帝汶的局势及来自“中原”的侨民与定居者的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19世纪下半叶，新移民(包括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粤语劳工、囚犯，以及来自广东梅县的客家人)逐渐涌入，葡萄牙属帝汶的华人口不断增加。1900年，华人口突破500人，多数聚集在殖民地首都及附近几个沿海城镇，掌控着大部分贸易，成为虚弱的殖民政权的重要支柱。另有部分人向东部和内陆地区探索，从事非法贸易，并助力开拓岛上的咖啡产业。

关键转折点出现在几次大的历史事件之后——1910年葡萄牙里斯本爆发共和革命推翻君主制、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及1911—1912年葡萄牙属帝汶爆发大规模反殖民斗争。葡萄牙共和革命为新的政治表达形式创造了空间，但在葡萄牙属地澳门，也催生了向帝汶流放囚犯(多为操粤语者)的系统政策。而中国辛亥革命则使持续十年的地下共和运动浮出水面，其领导者在帝力建立了第一所现代中文学校，并呼吁成立国民党分支机构。结果是：当原住民仍被束缚在传统忠诚与严苛的殖民法律排斥体系中，且葡萄牙共和主义的承诺仍受帝国统治逻辑与种族主义制约时，华人社团领袖掀起了民族主义浪潮，使帝力华人社群不仅通过贸易与巴达维亚(雅加达)、新加坡、澳门相连，更在政治上与孙中山等产生关联。

从1912年帝力第一所中文学校创办，到1974年里斯本“康乃馨革命”的数十年间，全球压力不断冲击葡萄牙及其帝国，对偏远的葡萄牙属帝汶影响尤为严重。1911年葡萄牙君主制被推翻后，共和运动试图推动葡萄牙及海外帝国的现代化，但不到20年，就被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的反动独裁政权取代。大萧条冲击全球经济，使葡萄牙属地即便最温和的殖民发展计划也化为泡影。二战爆发后，葡萄牙小心翼翼的中立政策使其与残暴的日本占领军产生勾结。战后，葡萄牙抵制国际社会的非殖民化呼吁，重新加强殖民统治。最终，1974年萨拉查-卡埃塔诺(Caetano)政权被军事推翻，葡萄牙属帝汶被抛弃。由于冷漠的冷战考量与印尼的后殖民傲慢，帝汶遭受了长达24年的残酷占领。

就这样,从19世纪初的小规模聚居开始,历经殖民统治、战争与流亡的摧残,东帝汶华人的人口从峰值约1万人锐减至1980年的2000余人。在此过程中,操闽南语、客家话、粤语的群体逐渐形成了“东帝汶华人”的身份认同。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少数群体。通过重构东帝汶华人的形成过程,我们试图论证华人——作为来源多样的群体和殖民统治的臣民——在葡萄牙属帝汶(进而在今日独立的东帝汶)的形成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二、有关海外华人的悖论与问题

仰光、新加坡、巴达维亚和马尼拉的殖民官员与学者长期密切关注所辖领土内的华人群体。但直到二战期间,随着1941年日军开始推进、1943年英国东南亚司令部成立,英、法、荷、美、葡在东南亚的帝国版图才被视为一个整体区域,海外华人被视为关键群体。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无论聚焦经济、政治参与还是文化生活,东南亚研究者都将海外华人视为“本质上外来却深度嵌入”的存在。用安东尼·里德(Anthony Reid)和丹尼尔·希罗(Daniel Chirot)的话说,他们是“必不可少的局外人”。

在殖民统治下,研究该地区某个或多个领域的西方官员与学者,几乎仅从经济角度看待海外华人。这一视角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华人在贸易和零售业中表现出极大成功,主导了多数城镇的商业,一些观察者将此归因于华人的优良特质(勤奋、有商业头脑、节俭),另一些则呼吁采取措施保护原住民免受贪婪“外来”商业阶层的侵害^①;另一方面,19世纪下半叶,大量中国劳工前往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等地,在烟草、靛蓝、橡胶等经济作物种植园从事繁重劳动^②。哈佛大学毕业的砂拉越研究者田汝康(Tien Ju-Kang)在反思外界对华人的经济刻板印象时写道:“关注华人的西方人往往持有强烈的观点。华人既是马来亚的支柱,又是‘东方的犹太人’——没有他们,一切都无从谈起;有了他们,却总有潜在的危险。”^③

二战结束后,东南亚非殖民化进程启动,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学者的关注点从海外华人的经济地位转向政治忠诚问题。对伦敦和华盛顿的决策者而言,1948年东南亚叛乱及英国在马来亚宣布“紧急状态”,引发了对海外华人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第五纵队”的担忧。对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等新独立国家的政府而言,华人成为公民权、经济机会与社会平等辩论的核心。在此背景下,20世纪50—60年代,新一代西方培养的学者开始对马来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的海外华人进行详细的社会学研究^④。尽管研究

①Chirot, Daniel, and Anthony Reid, eds. *Essential Outsiders: Chinese and Jews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nd Central Europ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②荷兰学界关于此主题的研究文献颇为丰富;在英文研究成果中,可参阅一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Cator, W.L.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6.

③T'ien, Ju-K'ang (田汝康). *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53] 1991.

④关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研究,可参阅:Purcell, Purcell, Victor. *The Chinese in Malay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Wang, Gungwu. "Traditional Leadership in a New Nation: The Chinese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In *Leadership and Authority: A Symposium* ed. Gehan Wijeyewarden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entr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66. 关于泰国的研究,可参阅:Skinner, G. William.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1. 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可参阅:TToer, Pramoedya Ananta. *Hoa Kiau di Indonesia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Indonesia]*. Jakarta: Garba Budaya, [1960] 1998. Willmott, Donald E. *The Chinese of Semarang: A Changing Minority Community in Indone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0, and Somers, Mary. *Peranakan Chinese Politics in Indonesia*. Ithaca, NY: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Cornell University, 1964. 关于柬埔寨的研究,可参阅:Willmott, Donald E. *The Chinese in Cambodia*. Vancouver: Publications Centr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61. 早期的区域性综合研究成果包括:Purcell, Victor E.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1965. Williams, Lea.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nesis of the Pan-Chinese Movement in Indonesia, 1900-1916*.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60. 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海外华人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大幅增长,近代早期的相关历史研究不断丰富,与学界长期关注的“同化”问题及其对立面——“歧视”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互补。

方法与侧重点不同,但这些研究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华人在何种条件下融入或不融入当地或国家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然而,20世纪70年代研究印度尼西亚的塔米·麦基(Tamie Mackie)仍评论道:“对华人的刻板印象依然盛行——要么认为他们是两个中国(或另一种说法是‘以新加坡为中心的第三中国’)的棋子,要么认为他们是政治上被动的商人。”^①

在许多学者看来,华人之所以“显眼”,不仅是因为外貌特征、文化刻板印象、商业头脑或机会、利益或意识形态,更与居住模式和互动方式有关。各殖民地与新独立国家的情况存在显著差异:菲律宾和暹罗(泰国的旧称)的华人同化程度较高,而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多数地区的华人则面临官方排斥(相应地也形成了排他性社群)。然而,在关于华人社会组织的经典研究中,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指出:“在东南亚各地,都能看到或大或小、活跃且有活力的华人社群。这些社群既证明了华人始终是‘外来且不可同化的群体’,也印证了‘中华文化优越性’的说法。”^②

帝汶华人远不如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华人受关注,但针对他们的研究往往遵循相似模式。20世纪50年代考察帝汶岛的荷兰地理学家R.J.奥梅林(R.J. Ormeling)问道:“帝汶华人最终对当地居民是有益还是有害?”^③如今这个问题或许已过时,但对“外来影响(包括少数群体)作用”的担忧,仍贯穿于许多帝汶研究中。学者常将海外华人刻画成刻板形象:不可改变的“华人”身份、唯利是图的商人、外国侵略者与歧视政策下的不幸受害者与顽强幸存者。要超越这些陈旧刻板印象,我们需要关注帝汶的特殊性,摒弃“来源多样的群体始终是‘华人’”的简单假设,不仅要探究他们的身份,更要追问他们在葡萄牙属帝汶及今日东帝汶的角色。

葡萄牙属帝汶华人作为殖民统治的臣民和殖民社会的参与者,其形成环境受三个因素影响:

一是地理与生态的特殊性。帝汶位于小巽他群岛最东端,缺乏东南亚其他岛屿由火山形成的肥沃土壤,且旱季漫长。这种环境适合岛上著名的檀香树生长,却不利于水稻种植。由于没有农业盈余,岛上未形成类似爪哇、苏门答腊、柬埔寨、泰国或缅甸的中央集权国家。人口分散在高地的小型定居点,权力分散于众多微型政权。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荷兰与葡萄牙对帝汶的领土主张,脆弱地覆盖着一系列或多或少忠诚的原住民附庸,以及他们知之甚少、互动更少的偏远地区(尤其是南部沿海)。

二是葡萄牙帝国的忽视。作为最早的欧洲海上霸权,葡萄牙在17世纪初已建立起从里约热内卢到罗安达、洛伦索马贵斯(马普托旧称)到澳门,最远端延伸至长崎及索洛尔、帝汶群岛贸易站的帝国。但葡萄牙很快被西班牙和荷兰超越,帝国逐渐衰败。1822年巴西宣布独立,对葡萄牙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经过一段国内动荡后,葡萄牙将注意力转向非洲殖民地,希望借此重振帝国荣耀。直到19世纪50年代,葡萄牙才开始在帝汶建立有效的殖民政府。即便如此,推动咖啡豆等经济作物种植的政策,仍与君主主义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深化(而不是变革)了半封建的原住民政治秩序^④。20世纪初,葡萄牙引入新的行政手段(包括现代人口普查和人头税),1910年共和革命后出现了短暂的改革热情。但到20世纪20年代末,萨拉查上台与

^①Mackie, J.A.C.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Five Essays*.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16.

^②Freedman, Maurice.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d.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9. Montesano, Michael J. “Beyond the Assimilation Fixation: Skinner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Spatial Approach to Twentieth-Century Thai History.”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1.1 (November 1005): 184-116.

^③Ormeling, Ferdinand Jan. *The Timor Problem*. Groningen: J.B. Wolters and Martinus Nijhoff, 1956. 该研究聚焦于先后处于荷兰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管辖下的西帝汶,但书中探讨的议题具有更为普遍的适用性。

^④关于19世纪葡属帝汶的政治与社会固化问题,可参阅:Kammen, Douglas. “Fantasy and Fossilization in the Study of Timor-Leste: Territoriality, Demography, and Status.” In *Fieldwork in Timor-Leste: Understanding Social Change through Practice*, ed. Maj Nygaard Christensen and Angie Bexley,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17.

大萧条爆发,使帝汶陷入“葡萄牙热带主义”(Lusotropicalism)意识形态与极端殖民剥削的双重束缚。葡萄牙属帝汶是亚洲西方殖民地中最落后的地区,这种落后是帝国统治长期延续的根本前提。

三是华人群体的特殊性。在东南亚各地,殖民范畴的“华人”包括来源地、语言群体不同,以及在原住民社会和殖民秩序中文化适应程度各异的人群^①。但在葡萄牙属帝汶,单一语言群体——客家人——在20世纪初成为华人社群中绝对且不断壮大的多数。这一现象属于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由于背景、移民时机和机会等原因,客家人向东南亚岛屿的边疆地区迁移^②。更具体地说,移居帝汶的客家人多来自广东省东北部的嘉应州,这里有较为悠久的反清历史,教育水平也格外高。这意味着帝汶华人社群的领袖及多数成员是(或逐渐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并始终忠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因此,当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华人仍受语言群体竞争、文化适应程度差异和多元意识形态立场的割裂时,葡萄牙属帝汶的华人少数群体却展现出异常高的社会与意识形态一致性。这种凝聚力又因20世纪帝汶遭遇的一系列悲剧而进一步强化:1911—1912年的马努法伊(Manufahi)叛乱、日本占领、二战后葡萄牙拒绝非殖民化、1959年维克克叛乱、1974年失败的非殖民化进程,以及1975年印尼入侵。

重构这一微小的少数群体(葡萄牙属帝汶华人占总人口比例从未超过1.5%)的历史,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东帝汶历史轨迹的理解。它对“殖民经历本质上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二元斗争”的常见假设进行了重要反驳。这种观点存在于许多优秀的帝国史研究中,并在后来的“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中部分重现^③。当然也有重要的例外:1975年,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Fretilin)成员阿比里奥·阿劳若(Abilio Araujo)在短文《东帝汶精英》中,以粗略的马克思主义视角谴责帝汶统治者与殖民政权的勾结;近年来,里卡多·罗克(Ricardo Roque)深入探讨了葡萄牙总督与官员对猎头术等原住民文化习俗的纵容^④。本研究进一步探讨这一批判,揭示岛上华人群体在19世纪推动殖民国家构建,以及此后缓和殖民互动中的作用^⑤。

从另一角度看,深入研究华人少数群体的历史,能更清晰地凸显葡萄牙属帝汶延续性与变革性的已知方面。尽管关于葡萄牙统治的研究强调停滞与落后,但本研究揭示,华人在推动贸易与咖啡生产、协助地方行政与税收征管、参与教育与慈善事业中发挥了开拓作用;尽管学者指出葡萄牙官员根深蒂固的政治保守主义,以及帝汶民族主义“晚熟”(通常定于20世纪70年代初),但研究表明,华人小社群的民族意识在

①学界长期以来最基础的分析性划分,是土生且已融入当地文化的华人与第一代操汉语的移民华人之间的区别,只不过相关界定与研究侧重点,会随着种族、出生地及方言等划分标准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印尼研究领域,这种划分最常表述为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人的二元对立;在英属海峡殖民地,对应的划分则是峇峇娘惹与早期概念中的“海峡土生华人”,相对应的另一群体则是“方言群”华人;在菲律宾,该划分体现为华菲混血儿与“纯华人”的区别。本研究后续将阐明,对于这些传统分类标签的常规使用方式,需要予以摒弃。

②这类情况不仅出现在帝汶,18世纪起的西加里曼丹也同样如此,20世纪的亚齐与巴布亚亦属此列。而苏哈托执政时期,上述所有地区均爆发过武装反抗运动,这一点实属蹊跷的巧合。

③最具重要性的帝国史研究著作包括:Martinho, Jose Simões. *Timor: Quatro Séculos de Colonização Portuguesa*. Porto: 1943. Oliveira, Luna de. *Timor na História Portugal*. Vols. 1-4. Lisbon: Fundação Oriente, 1999 and 2004. Matos, Artur Teodoro de. *Timor Português, 1515-1769: Contribuição para a sua história*. Lisbon: Faculdade de Letras da Universidade de Lisbon, Instituto Histórico Infante Dom Henrique, 1914. 聚焦本土能动性的核心修正主义研究成果有: Davidson, Katharine G. “The Portuguese Colonisation of Timor: The Final Stage, 1850-1911.” PhD dis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1994. Pélissier, René. *Timor en guerre: Le crocodile et les Portugais (1847-1913)*. Orgeval, France: [self-published], 1996. 关于帝汶人对历史的认知研究,可参阅: Kammen, Douglas. “Master-Slave, Traitor-Nationalist, Opportunist-Oppressed: Political Metaphors in East Timor.” *Indonesia*, 16(1003):69-85.

④Araujo, Abilio de. “Timorese Elites.” Trans. J.M. Alberto, ed. Jill Jolliffe and Bob Reece. Bueanbeyan, Australia: no publisher, 1915.

⑤诚然,这一观点并无多少新意——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殖民统治与社会变迁研究中,若干权威著作早已提出过类似看法。

20世纪初就已形成。作为区域运动的一部分,葡萄牙属帝汶的华人民族主义包含对共和理想的承诺和对帝汶全球地位的认知,以及对现代化的向往。

三、葡萄牙偏远的殖民地

1494年——哥伦布抵达美洲仅两年、达伽马抵达印度前四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促成《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将欧洲以外的世界划分为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大势力范围。出于宗教传播与财富获取的双重目的,亚历山大六世在大西洋画了一条假想的子午线,将线以东的所有土地划归葡萄牙王室控制,以西则归卡斯蒂利亚王国(西班牙前身)管辖。三十年后,经过多次探险,1529年《萨拉戈萨条约》在地球另一端划定了对应的反子午线,试图解决欧洲在东南亚岛屿的竞争。当然,欧洲新教国家无视天主教对世界的统治主张,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崛起,引发了对摩鹿加群岛(香料群岛)珍贵香料以及帝汶岛、松巴岛盛产的檀香木的新一轮争夺。这些商品正是爪哇、望加锡、马六甲和中国商人几个世纪以来的贸易对象^①。新欧洲列强与前辈的区别,与其说是拥有更先进的船只与火器,不如说是它们旨在实现垄断控制。最早的此类尝试发生在162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建立基地仅二十年后,总督彼得·德·卡彭蒂耶(Pieter de Carpentier)告知其在台湾的同僚(荷兰东印度公司刚在那里建立基地以向明朝施压):中国船只不得再前往北大年、占碑、巨港、望加锡、比马或帝汶进行贸易^②。

欧洲早期向东南亚的海上扩张中,一个巨大的讽刺是:葡萄牙与荷兰东印度公司都渴望对商品实现垄断控制,却仅依靠一连串设防的贸易站维持统治。这种经济模式与行政模式的矛盾,很快导致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葡萄牙王室的冲突,并使华人——包括中国本土船长及东南亚的华人商人——成为关注焦点。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葡萄牙争夺的主要目标是中国和日本市场,但这场争夺的影响波及整个东南亚,包括遥远的帝汶地区。

(一)帝国的入侵与贸易

欧洲早期官员与船长经常提到帝汶及东印度群岛其他地区的华人商贩。1615年,荷兰索洛尔指挥官阿德里安·范德费尔德(Adriaanvander Velde)评论道:“华人用瓷器、珠子、黄金等商品进行交换,这些物品在帝汶需求旺盛,荷兰人无法与之竞争。”^③到17世纪末,英国船长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访问利法乌(Lifau)——这个小型定居点已成为葡萄牙在帝汶贸易与领土主张的主要据点。在那里,除了少数葡萄牙人,以及“铜色皮肤”的天主教葡语族群“托帕斯”(Topasse),他还发现“有几个华人居住在此”^④。然而,这些资料均未提及这些男性华人的来源地、是短期访客还是长期居民,以及他们与原住民社群的关系。在欧洲人眼中,他们只是华人。

荷兰向索洛尔和帝汶地区的渗透,产生了两个对理解葡萄牙势力范围内华人贸易利益及华人社群的最终发展至关重要的后果:

在行政层面,为应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激进扩张,葡萄牙官员试图对王室领地实施更直接、高效的控

^①关于明代文献中对帝汶及檀香木贸易的记载,可参阅:Ptak, Roderich. "Some References to Timor in Old Chinese Records." *Ming Studies*, 17(Fall 1983):37-48. 至于欧洲势力到来前帝汶在亚洲区域贸易中的地位综述,可参考相关权威研究。

^②Blussé, Leonard.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Foris Publications Holland, 1986, p.116.

^③Ormeling, Ferdinand Jan. *The Timor Problem*. Groningen: J.B. Wolters and Martinus Nijhoff, 1956, p.101.

^④Ormeling, Ferdinand Jan. *The Timor Problem*. Groningen: J.B. Wolters and Martinus Nijhoff, 1956, p.101.

制。1672年,葡萄牙将索洛尔和帝汶群岛划归驻果阿的葡萄牙印度总督管辖。葡萄牙在长崎的贸易站是印度领地(Estadoda India)最遥远的前哨,但帝汶是其最偏远、或许也是最不盈利的附属地。

在贸易层面,出于对荷兰侵占利润丰厚的檀香木贸易的担忧,1678年果阿殖民政府颁布法令,允许葡萄牙在远东的商业中心澳门与帝汶直接贸易^①。这不仅增加了从帝汶运往澳门及中国内地市场的檀香木数量,也促进了华人(包括葡萄牙船只上的水手,以及从澳门或经澳门前往帝汶的商人)向帝汶的流动。

当欧洲海上列强入侵东南亚岛屿时,中国正经历对南海政策的重大变革。明朝早期,永乐帝在郑和下西洋期间开展了雄心勃勃的海上贸易与朝贡使命。除官方航行外,这一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私人贸易显著增加。然而,随着郑和(约1433年去世)及日本海上势力崛起、海盗活动频繁,明朝统治者逆转政策,颁布了一系列日益严格的海禁令。正如施坚雅(Skinner)对暹罗的研究揭示,这不仅导致明朝的朝贡大幅减少,也使得16世纪至17世纪初中国与东南亚的私人贸易相应增加^②。暹罗的情况很可能也适用于帝汶地区。

17世纪中叶,清朝建立后延续了海禁政策,担心来自被推翻的明朝支持者的报复,并颁布法令,命令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地区的居民向内迁移至多四里格(约16千米)^③,但对台湾和马尼拉(西班牙大帆船贸易的亚洲枢纽)贸易网开一面。海禁在中国南方沿海省份极不受欢迎,促使数千人逃往台湾,并引发新一轮向东南亚的移民潮。这也沉重打击了依赖中国劳动力与贸易的葡萄牙澳门港口。1639年葡萄牙失去日本贸易站,1641年马六甲被荷兰占领后,经澳门进行的帝汶檀香木贸易对葡萄牙变得更为重要。1683年清朝攻克台湾最后一个明朝郑氏据点后,逐渐放宽海禁,这不仅为欧洲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创造了空间,也刺激了中国与南方的海上贸易。结果是17世纪末华人在帝汶的贸易显著增加,葡萄牙官员很快抱怨,至少有十艘中国船只将檀香木从帝汶运往巴达维亚,再转往中国^④。

据研究早期帝汶地区的历史学家汉斯·哈格达尔(Hans Hagerdal)所述:“18世纪上半叶华人商人的到来,标志着古邦(Kupang)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⑤荷兰东印度公司警惕地维护对珍贵贸易商品的垄断控制,1717年颁布法令,要求所有在帝汶从事贸易的华人必须获得公司授权书,否则将被驱逐^⑥。尽管如此,以古邦为基地的华人仍活跃于帝汶各地向古邦的本地运输货物,而以巴达维亚为基地的大型船主则继续将货物从古邦运往荷兰东印度公司管辖的其他港口。事实上,荷兰在古邦的运营依赖华人,1758年的一份报告证实:“留居此地的华人为贸易提供了良好服务,维持了航运活力。同样,(经济活动的)租赁也因他们而得以维持良好状态。然而,他们多数人贫困且无力(从事生产性工作)。他们有一名中尉(雷珍兰,Lui Tenant)负责管理,每年缴纳费用。”^⑦

① Villiers, John. *East of Malacca: Three Essays on the Portugues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Bangkok: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1985, p.80.

② Skinner, G. William.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1, 6, p.1. Reid, Anthony.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The Land below the Winds*. Vol. 1.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5-16.

③ 关于清代贸易政策,可参阅:Souza, George Bryan. *Portuguese, Dutch and Chinese in Maritime Asia, c. 1585-1800: Merchants, Commodities and Commerce*. FarnArquivo de Macau, UK: Ashgate Variorum, 2014.

④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13, citing a Portuguese document from 1706 and VOC correspondence.

⑤ Hägerdal, Hans. “The Slaves of Timor: Life and Death on the Fringes of Early Colonial Society.” *Itinerario*, 34-2 (2010):25.

⑥ Lombard-Jourdan, Anne, and Claudine Salmon. “Les Chinois de Kupang (Timor), aux alentours de” *Archipel*, 56(1998):395.

⑦ VOC 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 3033 (1711), f. 1111a, Hägerdal, Hans. “The Slaves of Timor: Life and Death on the Fringes of Early Colonial Society.” *Itinerario*, 34-2(2010):19-44.

18世纪下半叶,葡萄牙对华人的政策远非一致。一方面,葡萄牙王室采取措施限制华人贸易:建立严格的海军巡逻制度以驱逐巴达维亚船只,1716年澳门总督禁止帝汶檀香木向东南亚其他地区销售^①;另一方面,葡萄牙官员同时讨论向帝汶派遣华人定居的可能性,但很快得出结论认为“实施难度太大”。三年后,当地爆发原住民起义,这一想法再次被提出。1719年,帝汶的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梅洛·埃·卡斯特罗(Francisco Meloe Castro)致信澳门政府,称急需“石匠、木匠和铁匠”——这些行业在澳门和广东都很发达^②。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帝汶对华人劳工的需求反复出现,处境艰难的总督不断请求派遣熟练工匠。而澳门官员提出向帝汶派遣华人的想法,动机却截然不同。1751—1759年任帝汶总督的曼努埃尔·杜特尔·德·菲盖雷多·萨门托(Manuel Doutele de Figueiredo Sarmiento)收到葡萄牙印度总督的信中写道:“澳门城墙内有许多生活极端贫困的人,其中不少人在城内找不到工作,表达了迁往利法乌的意愿……我认为没有理由不允许他们被送往帝汶。”^③

就在荷兰与葡萄牙寻求将华人商人排除在该地区之外的同时,清朝政策的变化也对帝汶产生了影响。1723年,雍正帝推翻了其父康熙帝实施的禁止中国贸易与探险的闭关锁国政策。结果,中国私商再次大胆开辟广东—望加锡—帝汶贸易路线,寻求珍贵的檀香木。华人的涌入和竞争压低了价格,威胁到葡萄牙在中国市场建立檀香木垄断的努力^④。

葡萄牙对“华人问题”的认知,不仅限于华人商人在帝汶的贸易活动,还与澳门的特殊地位及葡中关系整体状况紧密交织。18世纪初,几位帝汶葡萄牙总督曾在澳门担任市政议员或其他官职,因此有与清朝官员打交道的亲身经历,深知澳门的利益与王室的优先事项。反过来,清朝很可能将欧洲列强对海外华人采取的任何行动视为对其臣民的攻击,而任何回应都将涉及澳门。18世纪40年代,清朝当局开始打击澳门附近的基督教皈依者,双方紧张关系达到新高度。1748年,澳门总督安东尼·若泽·特莱斯·德·梅内塞斯(Antonio Jose Telles de Meneses)下令摧毁澳门的部分中国海关,并将两名被控在香山县杀害华人的葡萄牙人送往帝汶,阻止清朝当局对其提起诉讼^⑤。

与此同时,18世纪中叶,帝汶的葡萄牙总督面临托帕斯族群与原住民统治者持续不断的叛乱。香山县事件二十年后,特莱斯·德·梅内塞斯被任命为帝汶总督。1768年抵达后,他发现小小的葡萄牙定居点利法乌正被围困;一年后,他做出重大决定,放弃利法乌,于1769年在岛东部建立新首都帝力(Dili)。即便如此,华人仍在葡萄牙的考量中。1770年,特莱斯·德·梅内塞斯在致澳门上级的信中提到一位“华人商人”^⑥;

① Matos, A. Teodoro de. “Timor and the Portuguese Trade in the Orient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In *As Relações entre a Índia Portuguesa, a Ásia do Sueste e o Extremo Oriente*, ed. Artur Teodoro de Matos and Luís Filipe F. Reis momaz, 437-45. Macau: BCIC, 1993; Souza, George Bryan.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82-183.

② Arquivo de Macau, “remetter a Timor alguns Carpinteiros & Pedreiros” Arquivos de Macau, ser. 3, 9.3 (March 1968): 117.

③ Arquivo de Macau, “Sobre poder deixar hir p. a Timor alguns Moradores de Macao com suas Familias” dated May 4, 1711, Arquivos de Macau, ser. 3, 10.1 (July 1968): 1.

④ Teixeira, Manuel. *O Comercio de Escravos em Timor: The So-Called Portuguese Slave Trade in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XVIII, 611; Souza, George Bryan. *Portuguese, Dutch and Chinese in Maritime Asia, c. 1585-1800: Merchants, Commodities and Commerce*. UK: Ashgate Variorum, 2014, p.158.

⑤ 可参阅: Ptak, Roderich. “Macau: Trade and Society, circa 1740-1760.” In *Maritime China in Transition, 1750-1850*, ed. Gungwu Wang and Chin-Keon Ng, 191-212.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清]印光任、张汝霖撰:《广东巡抚岳睿奏闻哑吗噠等毁毙民人李廷富等依法办理情形折》,载《澳门记略》(下卷,澳蕃篇),澳门:澳门文化部,1992年,第238—239页。

⑥ Telles de Meneses, letter dated March 31, 1770, 转载于 Castro, *As Possessões Portuguezas na Oceania* 251-255.

1772年的文献显示,一名来自澳门的华人在帝力以东的马纳图托(Manatuto)镇担任贸易代理人^①。二十年后,伦敦出版的《绅士杂志》报道了爱德华兹船长(Captain Edwards)在南海的航行:抵达帝汶时,“一位华人首领前来,含泪为他们提供马匹,护送他们前往古邦”^②。此类记载并非仅限于欧洲文献,中国文献记载,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一位名叫黎社伯(Li SheBo)的商人携带丝绸货物前往“地满”(帝力的中文名),却在当地去世,未能返航^③。

(二)欧洲事务与帝汶现实

直到19世纪初,华人商人在帝汶沿海的定居点才出现在档案资料中。他们从古邦出发,沿北部海岸向东扩散,到达葡萄牙据点利法乌、小型自由贸易港阿塔普(Atapupu)、葡萄牙驻军城镇巴图加德(Batugade)、荷兰飞地毛巴拉(Maubara),以及帝汶新行政中心帝力。以这些地点为基地的商人从事沿海及深入内陆的贸易。现有记载较为简略,未明确这些定居者在中国的来源地或语言群体,但部分姓氏后缀“-ko”表明,许多人是来自福建的闽南语使用者^④。多数早期定居者可能来自爪哇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影响范围内的其他地区,带来的组织模式既反映了中国南方的根源,也体现了在巴达维亚及爪哇其他港口的经历。1816年法国船长路易·德·弗雷西内(Louis de Freycinet)访问古邦时,那里已有繁荣的华人街区、一座寺庙和一处墓园^⑤。

要更好地理解19世纪初帝汶小型华人社群的发展与地位,需先简要回顾数千英里外欧洲的事件。1804年,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自封为法国皇帝,吞并荷兰,任命其弟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为荷兰国王。1807年,拿破仑派遣远征军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Joao VI)及其宫廷人员勉强横渡大西洋,逃往里约热内卢避难^⑥。为应对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扩张,1811年英国军队攻占巴达维亚,占领荷属东印度大部分地区,包括帝汶岛西半部。古邦被英国控制,但英国与葡萄牙的“古老同盟”意味着副总督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尊重葡萄牙在岛东半部的领土主张^⑦。

拿破仑战争期间荷兰航运的中断,为东南亚华人商人创造了新机会。尽管欧洲和美国前往巴达维亚的航运帮助避免了殖民孤立,但华人航运“填补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商船在中国—巴达维亚航线留下的空白”^⑧。中国—巴达维亚贸易的情况,无疑也适用于东印度群岛东部地区(包括帝汶地区)的贸易。因此,1840年葡萄牙官员提到一艘由“China Alem”拥有的“圣安娜号”(Santa Ana)船只;次年,由“China Frihen”拥有的“娜哈旭号”(Nhunhaxu)访问帝汶^⑨。随着荷兰在古邦的权威削弱,华人商人与船只可从北部海岸的小型停靠港,直接前往望加锡和泗水。阿塔普凭借天然良港与岛屿中心位置,成为最重要的港口,十

① Lombard-Jourdan, Anne. “Une memoire inédite de F.E. Rosily sur l’Ile de Timor.” Archipel, 23(1982): 98.

② The Gentleman’s Magazine, vol. 64, no. 2, part 4 (October 1794): 933.

③ 刘芳辑、章文钦:《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澳门:澳门基金会出版社,1999年,第640页。

④ Hägerdal, Hans, Lords of the Land, Lords of the Sea: Conflict and Adaptation in Early Colonial Timor, 1600-1800. Leiden: KILTV Press, 2012, p.23. 但需说明,弗雷西内考察队于1816年记录的三块墓碑中,有一块属于广东东北部客家聚居区嘉应州的赖姓人士。可参阅:Lombard - Jourdan, Anne, and Claudine Salmon. “Les Chinois de Kupang (Timor), aux alentours de 1800”. Archipel, 56(1998), pp.424-425.

⑤ Rivière, Marc Serge, ed. A Woman of Courage: The Journal of Rose de Freycinet on Her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1817-1820. Canberra: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1996, p.56.

⑥ Birmingham Arquivo de Macau, A Concise History of Portugal, chap. 4.

⑦ 可参阅:Farram, Steven. “Jacobus Arnoldus Hazaart and the British Interregnum in Netherlands Timor, 1812-1816.”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163-164(2007):455-475.

⑧ Blussé, Leonard.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Foris Publications Holland, 1986, p.153.

⑨ Annaes Maritimos e Coloniaes, Lisbon, vol. 3(1843):186.

几名华人商人在此不受殖民干涉地开展贸易。在英国占领荷属东印度及华人贸易繁荣的背景下,帝力的葡萄牙总督下令在阿塔普设立海关。

1815年拿破仑在欧洲战败后,英国将荷属东印度归还荷兰;次年,古邦的荷兰驻扎官与帝力的葡萄牙总督开始讨论各自的领土主张,阿塔普成为焦点。这些讨论随后引发阿塔普的起义,总督若泽·平托·阿科福拉多·德·阿泽维多·埃·苏萨(José Pinto Acoforadode Azevedo Sousa)将其归咎于华人:“在阿塔普设立海关引发混乱的主谋是科瓦(Cova)的地方首领,他与科图峇峇(Cotu Baba)的首领勾结……并受到当地华人商人的煽动。”^①帝力的葡萄牙当局无力镇压起义,1818年古邦的荷兰驻扎官雅各布斯·阿诺尔德斯·哈扎特(Jacobus Arnaldus Hazaart)派遣军队入侵并最终吞并阿塔普^②。这一看似小事的事件产生了长期影响:在荷兰宗主权下,阿塔普的华人可自由在岛屿中部地区开展贸易,从而削弱了葡萄牙对帝力进出口贸易的垄断。

尽管拿破仑战争结束,葡萄牙仍深陷分裂。若昂六世在里约热内卢过得舒适,并在那里统治两个王国(葡萄牙和巴西)及庞大的海外帝国。结果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殖民权力倒置:宗主国受制于已成为王国的殖民地巴西,并在实际上成为英国海军力量与新兴自由贸易政策的保护国^③。葡萄牙数十年的政治反对派最终在1820年和平的自由革命中爆发,要求若昂六世返回里斯本,并同意建立君主立宪制。若昂六世顺从了,但1822年留在里约担任摄政王的儿子佩德罗(Pedro)宣布巴西独立。因失去最富饶的殖民地而受挫,19世纪30—40年代葡萄牙政客将非洲殖民地作为新经济政策的重点。澳门仍是重要的私人贸易站点,但对国家财政贡献甚微;果阿则急剧衰落。这使得帝汶成为葡萄牙帝国最偏远的附属地。

里斯本的政治动荡,加之檀香木储量减少^④,导致帝力状况惨淡。19世纪20—30年代访问帝汶的西方人均描绘了一幅帝国忽视、行政无能、经济停滞、环境恶劣的图景。他们观察到,仅存的少量商业掌握在华人手中,当时华人约有二十人^⑤。1817年,法国人雅克·阿拉戈(Jacques Arago)在环球航行中访问帝汶,评论了荷属古邦和葡属帝力的华人:“古邦的华人是唯一从事商业的人。他们是帝汶的犹太人,就像直布罗陀、法国乃至全球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在这个国家保留了自己的服饰和习俗……他们的贸易、以物易物,全是投机取巧。帝汶有三百名华人,其中只有一个诚实人。他们有寺庙和神像,但我相信,他们装作信教只是

①可参阅:阿泽维多·索萨(Governor Azevedo e Sousa)《总督的书信》(“Castro, As Possessões Portuguezas na Oceania”, 281-87。平托(Pinto)在《商人、中间商与走私者》(“Traders, Middlemen, Smugglers”)一文中援引弗雷西内(Freycinet)的记载称,阿塔普普(Atapupu)的华人商人说服当地首领“归顺荷兰管辖,并邀请荷兰人接管该港口”。

②Ormeling, Ferdinand Jan. The Timor Problem. Groningen: J.B. Wolters and Martinus Nijhoff, 1956, p.39. Farram, Steven. “Jacobus Arnoldus Hazaart and the British Interregnum in Netherlands Timor, 1812-1816.”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en Volkenkunde*, 163-164 (2007): 455-475. 哈扎特的此项行动未经巴达维亚当局授权,因此遭到暂时停职处分。可参阅:Davidson, Katharine G. “The Portuguese Colonisation of Timor: The Final Stage, 1850-1912” PhD dis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1994, p.65.

③若想了解葡萄牙王室驻留里约热内卢时期的生动历史图景,可参阅:Wilcken, Patrick. *Empire Adrift: The Portuguese Court in Rio de Janeiro, 1808-1821*.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04.

④Davidson, Katharine G. “The Portuguese Colonisation of Timor: The Final Stag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1994, p.8.

⑤1812年的这20人的数据出自:Figueiredo, Fernando Augusto de. “Timor: A Presença Portuguesa, 1769-1945.” PhD diss.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4, p.228. 基于此,六年后阿拉戈(Arago)称帝力正逐渐沦为“华人殖民地”的说法,便显得难以置信。相关内容另可参见:Lombard - Jourdan, Anne, and Claudine Salmon. “Les Chinois de Kupang (Timor), aux alentours de 1800.” *Archipel*, 56(1998): 396.

为了掩盖欺诈行为。”^①

阿拉戈对葡属帝力的印象更为负面：“即便是澳门政府派遣或从广州及中国其他边境城镇移民而来的华人，几乎都在毫无生气的面容上显露出健康不佳的迹象。”^②其他访问帝力的人也给出了同样惨淡的描述。1825年5月，荷兰船长D.H.科尔夫(D.H. Kolf)在帝汶短暂停留，观察到殖民行政机构的破败和城镇居民的普遍不满：“帝力的许多居民，无论是原住民还是华人，都向我表达了摆脱葡萄牙可恨枷锁的强烈愿望。”^③

帝汶的华人商人从事多数重要商品的进出口贸易。进口商品包括布匹、陶瓷、金属制品、酒精和各种小饰品，望加锡和爪哇港口是主要中转地。华人商人长期从事檀香木、蜂蜡、蜂蜜和玳瑁的出口贸易，19世纪初还助力推动咖啡豆种植扩张。1829年访问帝汶的荷兰特使所罗门·米勒(Solomon Miller)观察到：“每年旱季，都会有几名华人从古邦、阿塔普及其他沿海地区前往内陆，用马驮着适合以物易物的商品。这些商人从一个地区前往另一个地区，首先向每个地区的首领和贸易官员报告，赠送礼物以请求贸易许可，并获得各方面的安全保护……总体而言，原住民喜欢华人，乐于见到他们到来，通过这种方式接触各种外国商品和新奇事物，满足好奇心，迎合虚荣心。”^④

枪支和奴隶在经济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奥梅林写道：“直到19世纪后期，部落战争中捕获的囚犯仍被首领用来与华人交换火器和弹药，并作为奴隶出口。”^⑤华人商人往往不受荷兰和葡萄牙行政当局的控制。19世纪30年代，荷兰人伊曼纽尔·弗朗西斯(Emmanuel Francis)观察到：“古邦的华人在毛巴拉从事一些贸易，但那里完全没有(欧洲人)监管。”^⑥

这一时期，帝汶的华人人口仅有数百人。1817年阿拉戈估计总数为300人，1829年米勒估计荷属领土有500名华人，19世纪30年代全岛华人家庭估计为200—300户^⑦。这些都是粗略估计，而非实际人口普

①Arago, Jacques. Narrative of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Uranie and Physicienne Corvettes, Commanded by Captain Freycinet, during the Years 1817, 1818, 1819, and 182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23] 2013, p.188.

②Arago, Jacques. Narrative of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Uranie and Physicienne Corvettes, Commanded by Captain Freycinet, during the Years 1817, 1818, 1819, and 182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23] 2013, p.212. 阿拉戈还记载，帝力曾有一名华人男子迫使一名14岁华人少女卖淫，并试图谎称少女是自己的女儿。

③Kolff, D.H. Voyages of the Dutch Brig of War Dourga through the Southern and Little-Known Parts of the Moluccan Archipelago and along the Previously Unknown Southern Coast of New Guinea, Performed during the Years 1825 & 1826. Trans. George Windsor Earl. London: James Madden and Co., 1840, p.34.

④Müller, Salomon. Reizen en Ondersoeking in den Indischen Archipel: Gedaan tusschen de jaren 1828 en 1836. Amsterdam: 1857, pp.244-245.

⑤Ormeling, Ferdinand Jan. The Timor Problem. Groningen: J.B. Wolters and Martinus Nijhoff, 1956, p.110. 这些奴隶中，有一部分最终辗转至澳门。19世纪30年代时，当地已有数百名帝汶人定居。

⑥Francis, E.A. “Timor in 1831.” Tijdschrift voor Neerland, s Indie 1.1(1838): 360. 关于莫巴拉独特的政治发展轨迹，以及19世纪初当地近乎无政府的状态，可参阅：Kammen, Douglas. Three Centuries of Conflict in East Timor.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p.1015.

⑦相关内容可参阅：Müller, Salomon. Reizen en Ondersoeking in den Indischen Archipel: Gedaan tusschen de jaren 1828-1836. Amsterdam: 1851. Ormeling, Ferdinand Jan. The Timor Problem. Groningen: J.B. Wolters and Martinus Nijhoff, 1956. Hägerdal, Hans. Lords of the Land, Lords of the Sea: Conflict and Adaptation in Early Colonial Timor, 1600-1800. Leiden: KILTV Press, 2012, p.275. 1848年，一位澳大利亚访客估计古邦的华人人口约有300人，详见《新加坡自由新闻与商业广告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1848年10月26日刊载的“厄尔先生的报告(Mr Earl's Report)”。此后关于荷属帝汶华人人口的统计数据——1855年有720人，1871年增至817人——表明当地华人人口呈快速增长态势，这一增速远超前葡属帝汶的人口增长趋势。相关论述可参阅：Hägerdal, “Lay Atjien Liok and the Lidak War of 1852: Chinese Networking, Indigenous Agency and Colonial Intrusion in Eastern Indonesia.” Indonesia and the Malay World, 41.121(2013):322-347.”

查,但表明在葡萄牙和荷兰势力范围的殖民控制急剧衰落之际,华人人口仍在增长。

(三)殖民视角

历史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强调,迁往东南亚的华人移民进入了不同的政治生态:稳定的殖民环境(如荷属东印度、葡属帝汶),未被殖民的君主制国家(如暹罗),政治控制力薄弱以至于华人移民可建立或多或少的边疆地区(如西加里曼丹)独立政权^①。帝汶地区是这三种类型的有趣交汇点:荷兰和葡萄牙的直接殖民统治,仅限于少数沿海城镇;之外是忠诚附庸、不太忠诚的政权,以及完全无成形国家的地区。荷兰的行政效率高于葡萄牙,但岛屿中部地区是“无主之地”,有进取心的华人可进入甚至建立独立社群。当然,这些并非孤立区域,而是形成一个整体:凭借荷兰商业和航运,古邦成为核心;利法乌、阿塔普、巴图加德、帝力是相连的卫星城;内陆无数原住民政权是潜在市场。古邦的成功商人可能派亲属到帝力开店,而从福建或广东新来的华人可能从帝力前往中央山区甚至南部沿海贸易。

阿拉戈、德·弗雷西内、米勒等访问帝汶时,描述通常缺乏同情心,对华人的简短评论带有刻板印象,且常受种族偏见影响。这些作者均未深入探讨葡萄牙或荷兰对帝汶华人的认知,更未提及早期闽南人及其他华裔群体对岛屿、居民和殖民统治者的看法。幸运的是,有少量档案资料涉及这些问题。

19世纪20年代,葡萄牙官员反复表达对殖民地财政亏损的担忧。檀香木储量和出口量下降是主要原因,但行政人员不足、总督及其下属从事私人贸易的倾向也加剧了问题。关于经济状况的官方通信,常对帝汶的自然资源及农业生产(尤其是咖啡产业)前景做出相当乐观的评估。在官员看来,问题在于原住民人口“总体生产力低下”;而解决方案,正如官员所断言,是招募移民劳工。这并不奇怪,因为19世纪40年代的香港和澳门,已成为华南契约劳工(苦力)前往海外的主要出发点,目的地首先是美洲(秘鲁、古巴、加利福尼亚等),其次是东南亚、马尔代夫,甚至法属波利尼西亚保护地。

为发掘帝汶的潜力,葡萄牙官员定期考虑向殖民地派遣华人劳工。1816年,澳门海军与海外领地国务秘书派遣华人木匠和铁匠前往帝汶修理火炮^②。19世纪20年代,澳门官员讨论向帝汶派遣华人农民及其家庭的可能性,但结论是“不可行”^③。尽管缺乏精确数据,但19世纪上半叶澳门向帝汶派遣的囚犯,可能多于自由劳工^④。

尽管殖民档案揭示了葡萄牙官员对帝汶华人的复杂(有时矛盾)看法,我们仍想知道帝力及其他贸易站的早期华人商人如何看待所处环境及必须接触或选择规避的官员。他们如何看待殖民主张,或自身在帝国边缘的位置,他们用哪些参照系——原籍地、语言群体、清朝臣民身份,或连接帝力与古邦、泗水的网络——来定义自己?由于缺乏19世纪帝力华人居民撰写的记录,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似乎不可能。

自明朝郑和下西洋以来,中国文献长期记载帝汶是优质檀香木的来源地,因此是重要的贸易目的地。到19世纪初,随着檀香木储量急剧减少和殖民渗透加剧,中国关于帝汶的记载具有更强的政治性。一份特别有启发的中文记载来自澳门以北的香山县——这里长期存在葡萄牙经济及宗教利益与清朝官员的紧张

^①Kuhn, Philip A.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②Letters of António de Araújo de Azevedo, January 31, 1815, and December 11, 1816, in AM CO 葡萄牙国家档案馆殖民地事务部档案 655, cx. 38, no. 12, and cx. 41, no. 30.

^③可参阅:Figueiredo, Fernando Augusto de. “Timor: A Presença Portuguesa, 1769-1945.” PhD diss.,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4, 221-29; Macau e o Oriente vol. 2, no. 2607, and no. 2905, dated December 12, 1830. Letter of Secretary of State for Maritime Commerce and the Overseas, January 31, 1830, in AM CO 葡萄牙国家档案馆殖民地事务部档案 669, cx. 60, no. 26.

^④根据《澳门档案》(Arquivos de Macau)期刊所收录的文献显示,1812年、1818年、1820年、1824年、1826年及1827年,一批政治流放犯(即因政治立场获罪而遭放逐者,其中部分为华人)从澳门被遣送至帝汶。

关系。1827年出版的《新修香山县志》评论道：(帝汶)无主，土地为葡萄牙人分割，城内设有军事指挥官。(被送往此地者)几乎无人生还。犯轻罪者受鞭刑，犯重罪者被送往帝汶。罪犯或被绞死、屠杀，或用作炮灰。被判罪者中，不幸者入狱，幸运者被派往炮台^①。

还有一份更特别的文献保存下来，为帝汶当地华人视角提供了难得的一瞥。1843年，《海外殖民年鉴》(*Maritime and Colonial Annals*)刊登了一封名为阿金(A-Kem-io)的华人撰写的信。根据简短的编辑引言可知，此人在帝力居住多年。编辑未说明阿金在帝力的活动或居住时间，但可合理推测他在该书出版前十年曾居住于此。阿金可能受澳门政府雇佣，或为来自澳门、与政府有私人联系的商人。这封信包含对葡萄牙政府的12项建议，因此他很可能来自澳门，甚至可能受政府派遣评估情况或考察向帝汶派遣华人殖民者的前景^②。阿金这封非凡的信值得全文转载^③：

1. 总督及公职人员的住所不应设在当前位置，因沼泽与劣质水源导致当地气候恶劣，易引发疾病。西部的伦努索(Lunnuso)有两三处极佳地点，可建造美丽城市，土地肥沃，适合此目的。马鲁阿(Malua)也是一处健康之地，水源优良，当局确实应将住所设在此处。

2. 在帝汶治疗疾病，即使是轻微疟疾，也应在剖宫产手术中使用奎宁；此外，大黄、盐、油等可作为劣质水源的解毒剂。

3. 帝汶总督的薪资标准应由女王陛下确定，使其不仅能独立生活，还能拥有财产，以获得商人支持。

4. 在帝汶设置如此多的行政职位毫无用处，四人足矣，可协助总督工作。

5. 官员不应从事商业或贸易活动。同时担任公务员与商人会引发无数麻烦。

6. 在帝汶驻扎如此多士兵毫无用处，这会给公共财政带来巨大负担，而少量士兵足矣。此外，负责司法的检察官实施无数勒索行为。

7. 帝汶应隶属于澳门政府，因澳门比果阿更近，往来通信将更便捷。

8. 不应允许流放罪犯(degradados,被剥夺权利者)在城内定居，因他们是混乱与动荡的根源；更不应允许他们担任公职。

9. 在城内建立一两所学校应是政府关注的首要目标之一；同时应设立机械工匠作坊，向原住民传授各种技艺。

10. 帝汶的道路(即停泊处)与港口均处于开放状态，需增加两三艘船只，不仅可阻止走私，还能保护运送檀香木至城市的搬运工。

11. 应制定檀香木等资源开采法规，避免过度开采。

12. 在葡萄牙统治的帝汶土地上，每年产出超过一千皮科(pico, 计量单位)檀香木和两千皮科蜂蜡，但仅有四分之一产品缴税并运至城市，其余流入荷兰领土。

现有资料未显示澳门或里斯本葡萄牙当局的回应。然而，信发表一年后，里斯本政府宣布索洛尔和帝

^①转引自汤开建、彭蕙：《明清时期澳门人在帝汶的活动》，《世界民族》2007年第2期，第47—57页。鉴于这段记载出自修订版编年史，文中所提及的种种劣迹完全有可能发生在18世纪。

^②此事无疑是有先例的。1710年，香山县官员张振涛撰写了一份关于葡萄牙治下澳门的三部分报告。第一部分面向中国读者介绍澳门，阐述其地理概况与行政职能；第二部分指出当地行政体系的弊病；第三部分则立足中方视角，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改进对策。可参阅：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澳门编年史》(第二卷，清前期，1644—1759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3—982页。

^③“Projecto do Melhoramento do Estabelecimento de Timor, Offerecido pelo China A-Kem-iõ que Estado muitos Annos nessas Ilhas.” *Annaes Maritimos e Coloniaes*, official section, no. 2(1843): 71-73.

汶群岛将不再由果阿管辖,转而直接隶属于澳门。澳门不仅离帝汶更近,便于通信与贸易,且当时正进入因对华贸易繁荣而兴起的新时代,而果阿的命运早已衰落。尽管如此,葡萄牙当局仍过了数十年才意识到阿金提出的行政改革的必要性。阿金对商业的看法也颇具先见之明——几年后,荷属东印度政府宣布南苏拉威西的主要港口望加锡为自由贸易港^①,这刺激了整个东印度群岛的商业,帝力的华人商人很快与望加锡建立紧密联系,使得望加锡成为重要的咖啡市场及进口商品来源地。

四、结论

18—19世纪被吸引到东南亚的华人,遭遇了清朝政策与欧洲殖民实践不断变化的复杂局面。研究殖民时期菲律宾的埃德加·威克伯格(Edgar Wickberg)观察到:“西班牙的困境显而易见——没有华人无法生存,有了华人也无法生存。”^②在帝汶,荷兰和葡萄牙官员既警惕檀香木贸易中的外国竞争,又迫切需要任何可用的资源来维持统治。这种矛盾认知在葡萄牙王室身上尤为明显:一方面试图阻止不受监管的华人商业,另一方面又认为华人农民和工匠可能是解决殖民地经济问题的潜在方案。在古邦和帝力之外,华人船长和商人面对无数或多或少独立的原住民首领——他们关注地位、渴望贸易、警惕威胁。

在欧洲主张与原住民领主的交织中,华人商人依靠在澳门和巴达维亚获得的许可与推荐信、贿赂、礼物与恩惠,以及基于原籍地和语言群体建立的联系,编织自己的平衡网络与贸易网络。在此过程中,他们必然形成对帝国主张与实践的反向批判。许多人肯定明白,在帝力顺从殖民官员,与在内陆规避统治可以并行不悖。问题不仅在于行政力度的强弱,更在于殖民官员表现出的无知、偏见与反复无常。敏锐的观察者阿金认为,葡萄牙总督及其下属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他的建议是一套零散但极具实用性的路线图,为未来数十年的国家构建努力指明了方向。

^①此项决议的通告以葡萄牙语刊载于《澳门、帝汶及索洛尔省政府公报》(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1846年11月12日第1卷第44期。

^②Wickberg, Edgar. “The Chinese Mestizo in Philippine Histor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5.1 (March 1964): 67-68.

Foreign Land • Hometown • Qiaoxia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Evaluation of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Farm in Xianlin Town, Zhejiang Province after World War II You Yundi(57)

Abstract: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Farm in Xianlin Town, Zhejiang Province is a unique case of post-World War II national relief efforts for distressed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It is also the sol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farm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Zhejiang's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The distressed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from Qingtian, southern Zhejiang, who returned through the Shanghai, spontaneously organized to establish a farm in Hangzhou, northern Zhejiang, for self-reliance through production. During the farm's operation,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demonstrated their initiative in organically combining individual interests with macro policies, forming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local government mainly assisted in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dispute arbitration; while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led the production planning, material application, and autonomous management of the farm. However, due to the governance deficiencies and hasty response of the post-war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relief efforts,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farm was dissolved after only three years. Subsequently, under the proper arrangement of the new Chinese government, the farm members took root and rebuilt their homes. The farm members and their descendants underwent several identity transformations, repeatedly moving across three spaces: their hometown of Qingtian, their settlement in Hangzhou, and their overseas residences. This not only broke the traditional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Zhejiang's overseas Chinese immigrants, which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southern Zhejiang, but also intersected the two migrant chains from southern and northern Zhejiang in the new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of Hangzhou, providing crucial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racing the role change of Hangzhou from a foreign land to a hometown, and then to a hometown of overseas Chinese.

Keywords: Xianlin Town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Farm; Relief and Resettlement; Zhejiang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 Investigation of "Penang Hokkien Dialect":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Socialization...Toh Teong Chuan[Malaysia](68)

Abstract: "Penang Hokkien Dialect" is a Chinese social dialect centered in Penang, covering the greater northern Malaya region, including northern Perak, Kedah, and Perlis. This study first examines the demographic classifications used in censuses dur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period in Malaya to clarify the definition of "Hokkien" rather than "Holo" or "Minnan". It then addresses the specific nature of the "Hokkien" formed by these communities, investigating how many varieties of "Hokkien Dialect" existed in Penang and the true origins of what is now called "Penang Hokkien Dialect".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explores why, among various Hokkien dialects, Penang Hokkien Dialect emerged as the dominant social dialect.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predecessor of "Penang Hokkien Dialect" was "Baba Hokkien Dialect", which originated from "Baba Malay Dialect". Its formation represents a process of "re-Sinicization" among the Baba Chinese in Penang. Subsequently, its evolution into "Penang Hokkien Dialect" was the result of the "localization" of "Sinkheh" (newly arrived Chinese immigrants) under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British colonialism. Ultimately, the essence of Penang Hokkien Dialect has remained more instrumental than cultural in its social utility.

Keywords: Min-nan Dialect; Penang Hokkien Dialect; Baba Hokkien Dialect; Penang Chinese Peranakan; Re-Sinicization

Chinese in Timor: The Roles of Baba, Hakka, and Cantonese in Shaping East Timor—Immigration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imor Island

..... **By Douglas Kammen[USA] & Jonathan Chen, Translated by Zhou Jue, Revised by Ma Jianfu (78)**

Abstract: From the late 18th century to the early 19th century, groups such as Minnan dialect speakers, Hakka people, and Cantonese speakers from Fujian, Guangdong and other places in China moved to Timor Island one after another due to trade needs, the promotion of colonial policies, and the maritime ban of the Qing Dynasty. Influenced by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Portuguese colonial rule, Dutch colonial competition, China's 1911 Revolution, World War II, and Indonesian occupation, this diverse group has gradually formed a distinct identity as "Cina Timor" (East Timorese Chinese) after hundreds of years of integration.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paradoxes in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such as economic stereotypes and disputes over political loyalty, and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Timor Island's geographical and ecological particularities, the neglect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and the uniqueness of the Chinese group composition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Chinese. It reveals the important role of Chinese in Timor's trade expansion, the rise of the coffee industry, and the assistance in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cognition that "colonial experience is a binary struggle between colonizers and colonized", and demonstrating the unique value of Chinese as "essential outsiders" in East Timor's historical process.

Keywords: Timor Island; Overseas Chinese; Immigration History; Identity Construction; Colonial Rule;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